

【社会学研究】

为权力之“恶”辩护

——权力的话语遁入与效用

庞飞^{1,2}

(1. 韩山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2.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福柯及后现代思想家们对权力的批判与解构,加深了人们对权力的“恶”性认知。权力的片面“恶”性面向,会导致人们忽视权力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忽略权力在人类生存及人性实现中的积极意义,从而对未来失去信心,陷入悲观绝望的泥沼。权力在话语形成、欲望满足及人类整体存活中的效能造就了人类文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权力逐渐遁入到真理话语之中,缓解了其显性的暴力特性,为人性实现及人类的自我解放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权力;话语;积极效用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章编号:**1673-5420(2018)03-0060-09

在强调平等、自由理念的现代社会中,对权力的管制与祛除是其建设的核心任务。通过人们的不懈努力,权力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从显性变为隐性,由中心性变为弥散性,最终遁入使人们难以意识到其存在的知识与话语之中。消极与积极效能是权力的一体两面。基于现实与历史的原因,思想界对权力的关注更多地聚焦于前者,而其积极的一面长期受到忽视。

提到对权力的现代分析,人们自然会想到福柯对其进行的歇斯底里的揭露,权力批判似乎成了福柯的代名词。拉康甚至认为福柯的思想可称为权力之镜^{[1]280}。福柯追随尼采,继续批判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知识自由观念,认为知识不是人类与尘世权力作斗争,寻求解放和内在自由的武器,而是权力斗争的产物^{[1]171}。人们无法通过学习知识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一观点是尼采、福柯发现的权力奥秘,这一奥秘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根基。后现代思想家们如布迪厄等人在此基础上,对知识和话语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彻底的、全方位的审视,进而对现代社会肌体进行大胆解构,大有将权力“赶尽杀绝”之势。然而,人们并未找到摆脱现代社会困境的出路,最后连自身也陷入逻辑的撕裂与对未来迷惘的泥沼之中,

收稿日期:2018-03-1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庞飞,韩山师范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会问题与福利等。

基金项目:广东省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权力视阈下家庭教育对潮汕文化传承及变迁的功能机制研究”(2015-A-12);韩山师范学院青年项目“权力视阈下的家庭教育与文化传承及变迁——基于潮汕文化”(WQ201503)

而这一切与人们对权力片面的“恶”性认知不无关系。

话语、知识、真理,是福柯对隐性权力披露的主战场。那么话语与真理为什么会被注入权力的基因?权力为什么能借助知识(真理)的躯体大行其道?权力对人类个体与整体存活有何功用?权力的话语遁入是否有利于人类自由及人性的实现?权力的这一演变趋势是否蕴含着摆脱现代社会困境的出路?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除了对福柯的权力批判进行理解之外,还需要对权力的积极面进行考察。其实不难理解,权力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中大行其道,并非因其消极面的肆无忌惮,而是由于其积极面的效能实现。若我们在对现代社会进行透骨的批判之余,能够对权力在人类解放中的实际效用进行肯定式的思考,无疑有益于对现代社会形成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不至于陷入极端与狭隘的境地。

一、话语中的权力基因

福柯指认,“在每个社会,话语的生产是同时受到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物质性”^{[2]274}。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认为,词语是富含能量的,语词之间能够“传电”,能产生和互相产生某些品质,这种能量像电或辐射波可以链接、整合,类似流水,从金色的沙滩上喷涌而出,迅速游走,当然也可以将它想象成任何意象^[3]。由此发现,无论是福柯还是庞德,都意识到了语言本身的能量。同时,信息哲学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物质辐射与反射粒子构成的信息场中^{[4]49},并在信息场中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5]23}。由于信息具有能量的某些特征,语言可被视为是人类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交流的方式、过程与结果。索绪尔将人类的言语活动分为言语和语言,言语要成为语言,必须具备某种公共特性,公共性使没有沟通效能的言语变成语言。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类相互之间需要对言语的表达达成某种协议,对人类个体的表达需求进行规范化处理,对个体因刺激而集聚的能量释放进行规范和约制。借福柯的话说,这个协议是一个排斥程序,排除了其他方式及其可能性。对其他的可能性来说,协议具有极大的压制作用,只有符合协议的发声或释放,才是可以被接受的,才能成为语言,否则只是无效的言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语言的形成是能量压制、排斥及聚集的结果。

当然,语言、知识与真理在福柯话语的语境中不能等同,但它们之间都具有权力基因的沟通特性。语言(知识、真理)一旦产生,就具备了其独有的内在属性,从而呈现出客观独立性,也就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衍生变化规则和运行规范,这一原理在康德关于自主性的哲学思想中得以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其压制性、暴力性的一面逐渐隐退,只呈现出客观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索绪尔才会认为语言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平等进入的工具。但语言、知识及真理并不是权力的真空,它们都只是权力温柔的外衣。这一奥秘被尼采、福柯等人在对权力的彻底审视过程中揭示了出来,从而使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知识与真理中权力的存在。

由此可见,语言的产生是能量压制与聚集的过程与结果,在语言(话语)中渗透着权力的压制和强迫。但权力的意志性又是如何注入话语之中的呢?

众所周知,个体在社会中分布于不同的空间,占据着不同类型和数量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资源因其重要性和有限性,在社会运行中起到社群链接和整合的作用,也构成认知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然而在特定的时空中,社会对某些特定资源的强调和追寻,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因资源占有的类型与数量的差别而呈现出社会层级差异,且这种差异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商谈无法消除,从而导致在话语协议商谈过程中,不同质与量的资源占有者拥有不同的话语能量,社会成员之间的能量贡献出现差别。这也就导致了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的非均衡分布。同时,在协议商谈的过程中,基于自利性假设,社会成员会将自我意志渗透到商谈的话语之中,凝聚在规范协议之内,最终,协议成为社会成员的意志承载与实现机制。由此,话语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是资源能量较量的过程,即权力运作和斗争的结果,当然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话语因被注入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而具备了权力的意志要素。因此,话语的产生并非平等性商谈的结果,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平等理性沟通,只能是超越现实的理想类型。

协议一旦产生并成为言语能量的释放规范,社会成员的话语实践便都需遵守这一约定,否则话语会因为缺少公共特性而失去社会沟通的效能。同样,协议形成后,逐渐具备了自我独立的演绎规律,呈现出相应的客观独立性。任何社会成员都需遵行其客观的规范性约制,并将其内化到自我之中,从而融入社会。但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失去了自我。福柯1970年春天在法兰西学院做就职演讲,开场就说:“我正在说自己并不是缔造者的话语。”^{[2]273}他引述贝克特《无名的人》中的陈述,告诉大家当时的演讲是“话在说我”^{[2]274}。当然,福柯这里所说的“话在说我,我只是话语的表达躯体”的意涵要比这里讨论的语言(话语)内涵丰富得多。但无论如何,话语的客观性导致的人类主体性的缺位在福柯的这句话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表面上是人在说话,但实际上人的言说,是被背后看不见的“没影点”所迫使的。从而,拉康通过其镜像阶段理论将自我进行彻底的解构也就能理解了。

话语的权力特性不仅表现为在语言协议达成的过程中被注入权力基因,还表现为言语的非平等性进入。权力因素对权力的支配与真理性的判断,表现在话语的排斥机制之中。话语的排斥机制通过“禁律”表现出来,主要有言语对象的禁忌、言语环境的仪规和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这三种^{[6]3},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话语的权力运作机制,也是福柯着重分析的一对排斥原则,即区别和歧视,在话语的真理领域表现为理性和疯狂的对立^{[6]3}。通过对这一排斥机制的分析,运用真理机制将真理的权力性揭露了出来。

基于信息理论,言语的产生被认为是外界的刺激及内在的能量集聚与释放。通过沟通协议的达成,语言最终成为能量与意志规范化的释放方式。不仅如此,权力还借助言语的禁律、区别和歧视机制,穿上真理话语的外衣,运行于话语实践主体之间。话语逐渐驱逐了人类的自我,占据了沟通的主位。

二、权力在话语(真理)场域的欲望实现

权力基因注入话语之中,除了通过沟通条件的话语协议实现之外,还体现在话语的排斥性

控制程序之中,即真理体制。在福柯看来,这一程序包括禁止、分隔与抛弃,以及真与不真的区分^{[2]275},而真与不真的区分,构成了我们话语的求真意志,也即真理意志。真理意志在社会中得到了制度性的支持与实践,这些制度以外部专制对立物的身份出现^{[2]277},从而使其能被人们不加反思地极力拥戴。真理意志、知识欲望作为权力的外衣,通过真理话语的方式,以一种温和、隐性而狡诈的普遍力量强加于人,人们被其中立的外表所欺骗,对其庞大的排斥机制和隐性暴力却毫不知情,直到尼采、阿尔托和巴塔耶揭穿了它们的诡计。

真理意志被注入了欲望与权力的因素,因此,不仅要注意权力发出者的欲望,还应注意权力实施对象的欲望及其对权力的渴求,才能理解布迪厄视阈中的权力“合谋”情景^{[1]174}。在真理体制的排斥性机制中,权力对象只有接受其“暴力”,才能享受话语权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理体制本质上就是权力的生产与分配机制。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是运行这一机制的主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学校就是现代社会权力生产与分配的机器,是现代社会为达到某种控制效果而配置的。社会成员只有参与到这一强大的体制之中,接受布迪厄话语中的“符号暴力”^{[1]173},才有获得权力及话语的可能,也才能在此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欲望,实现其权力渴求。由此可见,那些被强制和规训的对象,是在渴求权力和满足欲望的驱使下,去迎合真理话语机制,接受甚至追求这种强制与规训的。所以,表面上是真理的大行其道,本质上是欲望与权力的生产与对接。流淌在真理意志下面的是权力与欲望的洪流。权力及欲望在真理的外衣下得到相互支撑性满足,是一种“合谋”与共生。当然,这是福柯等人竭力揭露与批判的内容。

在欲望的推动下,权力运行得到了其拥有者及实施对象的拥护,权力“暴力”的对象也心甘情愿地参与“合谋”。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由于权力的真理性伪装,使权力对象在无意识中接受和拥护权力,甚至心甘情愿为之辩护,表现出一种痴迷的状态^{[2]283}。那么,权力的暴力性从何而来?暴力性是针对谁而言的?是针对权力对象,还是针对高扛现代批判大旗的大师们?谁又更具有权力暴力的话语权呢?这些问题似乎值得我们再次深入思考。对于暴力一词的运用,需要谨慎,要注意其涵盖的特殊意境。在为了实现欲望与权力而迎合真理体制的过程中,权力对象并未感受到真理体制的暴力性与压制性,二者是在你情我愿的情景下发生关系的;另外,暴力一定是针对主体的意识层面而言,而非无意识层面,在无意识层面至多是引诱或操纵,而非暴力。也许这正是福柯等人要做的工作,去唤醒权力的对象并告诉他们,你比你想象的更自由!但无法否认的是,真理体制客观上也成了权力对象的欲望实现机制。

三、权力在人类整体存活中的效用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权力的压制性和暴力性,也就是霍布斯眼中权力的恶性,这种恶性构成了利维坦的灵魂,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的灾难都与权力不无关系,这无疑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但是,权力本身又是人类文明的生产机制,在托克维尔看来,人类的文明产生于权力的压制,灿烂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开出的权力之花。要理解这一点,除了需明晰权力关系的运行实际上是人们欲望的合谋性满足之外,还应注意权力对人类生存的积极贡献。在这一点上,就

连对权力进行彻底审视的福柯也指认,权力有时不是压制主体性,而是促进、培养和鼓励主体性。权力通过创造,形成知识和话语而运作,将生命价值最大化,它提供了而不是剥夺了人们的主体性^{[7]201}。

要理解福柯对权力的积极论述,我们可以进行一场语言产生机制的思想实验。语言(话语)还没有诞生之前,能量的释放与表达方式在理论上存在无数种可能。这无数种可能蕴藏于每一个特殊的个体之中,如若没有共同的接受与表达平台,没有共用的协议,能量永远无法在群体之间流动,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无法进行沟通与交流,内在的能量也就无法释放与传递,从而不会有社会的合作与团结,也就没有人类群体的形成,当然,个体的人性也就无法在生命历程中得以实现。而权力在混乱复杂的混沌状态中,起到了聚集和简化能量的作用,提高了沟通和交流的效率,搭建起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桥梁,使团结与合作成为可能;也提高了个体和群体的生存能力,为人类文明开启了闸门。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认为,权力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是社会复杂性的重要简化机制^{[8]147},哈贝马斯也同样意识到权力的简化作用,只是将权力这一作用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讨论^{[1]79-80}。权力在话语的形成与社会的运行过程中,起到终结性的简化作用,提升了社会沟通与运行的效率,以及人类整体的存活能力,创造出人类的灿烂文明。

权力对人类整体的效用除了表现在因其简化作用而提升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之外,还表现在对人类生存介入点的转移。这一点在福柯的生命政治中给予了呈现。福柯在其《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以生命权力概念为基础,对权力的人类整体效用进行了阐述。他在阐释生命权力的过程中,将其与君王的权力进行了对比性描述:“君王的权力只有在其可以杀人时才有效果”^{[9]227},也就是“使人死让人活的权力”,而19世纪之后的生命权力表现为“使人活而让人死的权力”^[10]。以生命权力为基础而运行的生命政治干预的是作为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生命要件与环节,从而保障族群的生命安全,以期提升人类整体的存活能力。在前现代社会中的君王是通过“使人死”来实施权力,而生命政治则是按“使人活”的逻辑运行权力。但在生命政治的运行逻辑中,权力的柔软性、隐秘性得到加强。权力介入点的转变,体现出人类社会权力着力点的变化:主体性权力通过对肉体和生命的惩戒来实施,是一种顺其自然“让”的态度;生命权力则关注生命“活”,对生命进行扶植,“死”不再是权力的干预对象,只是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让”其运行,采取的措施是自由放任之下的安全部署^{[11]27}。从这一过程来看,福柯眼中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与运行,是启蒙运动以降的自由意识形态更深入的运行状态,是社会治理的更高形态。对于福柯率先提出的生命政治的观念,在思想界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对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治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最为突出的代表是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甘本,他认为生命政治的社会治理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变成赤裸的生命,会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奥斯维辛;另外一种则对生命政治的治理形态持积极乐观态度,主要代表有哈特、奈格里,而最为突出的是阿甘本的同胞埃斯波西托,他们都强调生命政治治理对生命整体的扶植,认为其保障了生命共同体的安全,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持人类整体的存在。当然这两种立场都源自于福柯对生命政治本身的暧昧态度,福柯在对生命政治中无主体、弥散、隐性权力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积极的考察,如其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的观点阐述。

所以,权力对人类的整体效用被福柯在阐释生命权力运行奥秘的同时被揭示了出来,而这也是19世纪以来,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深刻演变的结果。从福柯对权力的演变考察路径来看,权力经历了具有向心属性的统治权、全景式制度规范监视的规训权到社会安全部署的社会治理权的演变过程,但要注意的是,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更替过程,而是多重权力作用叠加生成的一种复杂权力形态构建起来的治安场,其核心是人类整体的安全部署^{[11]51}。

从社会形态来看,18世纪以来,经济领域先后经历了以生产和消费为主的社会形态,但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高度强调人的价值。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中,福柯发现,每一个社会生命都是具有生产潜力的主体,那些“不正常”的主体应被社会尽最大努力拉回到“正常”的界域中来,使其具有生产的价值。人的生命价值则体现在其具有生产意义,这一点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得到了同证。布希亚深刻地分析并指出,当进入到以消费为主的社会中时,社会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由生产价值变成了消费潜能,权力的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规训权力变为社会治理的生命权力。但无论哪一种权力形态,对人类群体生存来讲,都起着调节和支配作用。生产性社会强调生产能力的提升,社会的生产潜能得到释放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消费型社会则强调通过消费促进社会的发展,引导甚至是引诱(布希亚语)社会成员释放其消费潜能,使社会成员的各类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所以随着现代社会的演变及权力形态的变化,权力对人类生命的支撑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全面。

如若我们不去探究权力对某一具体的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功效,而是关注权力对人类整体的效用,我们就不难发现,权力不仅在生命政治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还在整个人类的生存演化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效用。无论是在加强交流与沟通中的话语形成、提升群体生存能力的组织构成、社会交流互动的简化,还是在孕育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权力都无法缺席。

四、解构权力暴力构序后的人类出路猜想

福柯在竭力揭露权力在话语中的建构性暴力之余,也积极回答了人们特别关心的话语反抗或祛序的可能性问题,指出了反抗的可能性道路。他认为,要想进行现代话语权力构序的造反,必须坚持四个祛序的法则,即颠覆的原则(反向颠覆性思考)、不连续性原则(打破传统连续性的假象)、特殊性原则(破解普遍性的逻各斯)和外在下性原则(回到演化的原始起点,承认事物的多重可能及演化的偶然性,反抗核心及中心本质)^{[2]282-283}。不仅如此,还需要立足四个核心的祛序概念——事件、系列、规律性和可能性状况,分别消解暴力性权力构建的四个概念——创造、统一性、独创性和意义^{[2]289}。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坚持两种分析方法:批判分析和谱系分析^{[2]290}。而这种祛序并非为空洞的批判而批判,最终目的是要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对这一点,福柯也有意识,但是他似乎只是提出问题,承认他的工作是一种扰乱性的工作,是祛除人们自然“安全”误识,给人带来“危险”的工作^{[7]71}。福柯似乎只是给了人们一副新的看世界的眼睛,但至于怎么看,或看到了什么,那是实践者自己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隐隐约约感受到福柯某种唯物主义的的品质,他认为事件哲学应沿着非实体性的唯物主义的方向前

进^{[2]290},这也许就是他1970年被聘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以后由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构境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征象。不仅如此,福柯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所用的武器还是基于布尔乔亚启蒙运动过程中所提出的自由、人类解放之思想,而这些工具在现代社会进行建构之时就已具备,其思想只是对现代社会伊始确立的理念、原则的激进反思与推进。对这一点的理解,可以借助康德开创性的论述,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具有自我批判的开放性系统,在其建立之初就植入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基因,从而具备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康德的这一论断在现代社会的实际演变,以及在如马尔库塞关于阶级的分析中都能得到佐证,在激烈的现代与后现代思想讨论中也能窥见一二。英国的杰拉德·德蓝蒂甚至认为并不存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划分,它们都只是反思和怀疑精神的产物^{[12]5}。

有人也许会觉得,如果我们按照福柯所指引的反抗技术去实践,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使一切坚硬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人们是否能够承受自由的代价?整个社会是否有再次陷入弗洛姆笔下“逃避自由”的风险?我们似乎抛弃、批判了一切,是否如黑格尔说的我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小孩也一起倒掉了?我们的所有批判是否会让一切无从站立,最后只剩下一只空碗^{[13]36}?或者相反,最终人类会如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正走向一个自己编制的铁笼中,而无法实现自由及自我解放?对此,笔者认为不用急于悲观地得出结论,如若从权力控制技术的演变历程及其运作逻辑的转变趋势中来考察权力对人类支撑的效用,将看到的是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积极趋势。鲍曼探寻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权力技术,发现对权力实施的保障方式先后经历了从散点监控到全景监控,再到单向监控^{[2]338}的演变。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欠发达,社会流动相对缓慢,人员的生存空间相对固定,使权力以熟人监控和政权的强制性实施的方式得以贯彻落实。前现代社会中权力管理的是人的肉体,是对身体的自由进行管制。在此社会形态下,权力是中心的、显性的、强制的,甚至是残暴的,权力的介入点是能使你“死”。进入现代以后,人的价值意义直接体现在生产价值上。为保证社会成员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符合社会的生产意义,而不产生偏离,权力以全景监督的方式实施,其日常运行以纪律的形态呈现。由此,权力不再以中心化、主体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是遁入到语言(话语)、知识与真理之中,以无主体性、弥散性的方式呈现出来,采用类似于话语的各种微观技术对人们进行内化与规训。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纪律或知识进行自觉内化,使权力在“自然”的状态中得到运行。权力的压迫性、残暴性逐渐隐藏了起来。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介入点是使人“活”。到了后现代社会,生产能力不再是约束人类的主要问题,社会财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积累,物质财富不再是人类生存的束缚,人的社会价值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在消费社会中,人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消费潜能上,人们通过消费既满足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又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此社会中,权力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活”的问题。在后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运行逻辑仍然是使人“活”,但介入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权力着力于人们生存的环境及其维护,聚焦于“安全”,遵循治安“照看”逻辑,体现对现代社会的牧领意义。在此趋势背景下,人们除了反抗和解构权力的建构性暴力之外,如何去建构接下来的生活?对于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再从福柯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找答案。

有人认为福柯否定、批判了一切,而没有肯定什么^{[14]92},这样的评价是不准确的。福柯

虽然对权力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与批判,但他并未否认权力在人类自由实现中的积极效用。福柯认为,自由和政治、自我技术和权力技术从来就密不可分^{[15]6-8},他运用权力谱系学的方法,在古希腊社会中寻找现代社会可能的出路。福柯并没有遗忘,对现代社会体系中权力运行的揭露与解构,其目的还在为新的建构探索可能性,并且付诸实施,即在国家“照看”治理逻辑中,现代社会的人们要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逐渐趋于成熟。在福柯后期的思想中,将康德的这一批判精神予以执行,把对现代社会批判与反抗的探索,集中到了自我技术的伦理性关注,认为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反抗自我,使自己成为与自己不同的人^{[1]262},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自我技术(艺术),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具有审美的意义和价值。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对自我的一种精神锻造,是一种由他人照看转向自我照看的过程。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波德莱尔的看法,他认为的在福柯眼中,所谓的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苦行式地对自己进行精心塑造的态度^{[16]32-50}。这种精心塑造,是在尼采笔下强力意志的推动下,积极、主动地去谱写生命的乐谱,从而让生命在苦难的锻造中开出绚丽之花。

所以,现代社会的出路还在康德提出的人们可以通过批判而获得成熟化的构想中,是一个从他人照看转变为自我锻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权力以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发挥着其积极作用。

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权力在人类社会中以什么形态出现,并未改变其核心价值意义,即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强化人类整体存在。综观权力的历史形态演变趋势,会发现权力由显性的、中心化的和主体性的形态向隐性的、弥散性的和无主体式的形态的转变过程,也会明晰权力逐渐向话语、知识及认知方式里遁入,由粗暴地压制向温柔精妙地支配方式转化的趋势。由此会发现,权力似乎是人类的监护人,随着人类整体的觉醒与成熟,逐渐功成身退。权力由显性到隐性、由外在强迫到内在认可,使人们在自我意志的支配下,自由地实践生命的意义,追求美的生命历程,活出生命的艺术,实现人性的解放。这一结果,不正是人类苦力追寻的吗?

参考文献:

- [1] 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 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3] 张文英,张雨萌.从“语言能量”观视角解读网络新词的生成机制及其翻译[J].外语电化教学,2014(3):27-31.
- [4] 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5] 诺伯特·维纳.维纳著作选[M].钟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 [6] 徐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7] 阿德里娜·S.尚邦,阿兰·欧文,劳拉·爱泼斯坦.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M].郭伟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8]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路[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0] 蓝江,董金平.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J].哲学研究,2015(4):112-117.

- [11] 福柯. 安全、领土和人口[M]. 钱翰, 陈晓径,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2] 德兰蒂.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知识、权力与自我[M]. 李瑞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3]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 [14] LEMERT C, GILLAN C. Michel Foucault: social theory as transgression [M]. Warrent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5] BERNAUER J, RASMUSSEN D. The final Foucault [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8.
- [16] RABINOW P. Michel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 [M].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1984.

(责任编辑: 楼启炜)

Speaking in defense of the “evil” of power: the retreat of power into discourse and its utility

PANG Fei^{1,2}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2.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ritique and deconstruction of power by Foucault and other postmodern thinkers may lead to people's one-sided cognition of the “evil” of power, which makes people ignore the value of power i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ower in human existence and in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nature, thus leading people to lose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and sink into the slough of pessimism and despair. The utility of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discourse, the satisfaction of human desire and the human survival as a whole creates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power retreats into the truth discourse and alleviate its dominant violent characteristic, which provides possibilit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power; discourse; positive utility